



CHINA NEWS DIGEST — CHINESE MAGAZINE (CND—CM)

• — • — •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(CND) 主办 • — • — •

—— 增刊 第四八八期 ——
(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版)

本期目录 (zk0603d)

【文革岁月】	排演“样板戏”的岁月	王德彰
【文革文献】	陈再道的口头检查	陈再道

小启：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《文革博物馆》“最新展出厅”及各有关“展厅”，欢迎前往参观。

文革博物馆网址：<http://museums.cnd.org/CR>

欲订阅本刊《文革博物馆通讯》请致函 cnd-info@cnd.org 获取订阅资讯。

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@cnd.org。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。

【文革岁月】

排演“样板戏”的岁月

• 王德彰 •

准确地说，文革期间唱响全国的那些被称为“样板戏”（全称是“革命样板戏”）的剧目，并非诞生在文革期间，而是早已有之，只不过在文革期间进行了一些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改编、修改、“升华”，成为江青“钦定”的“样板戏”。这样，“样板戏”遂成为文革期间的特有名词而广为人知。

我接触“样板戏”较早，在其未冠名之前，就看过好几出。1965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后，即被分配到设在时为河北省省会天津的河北省戏曲研究室（今河北省艺术研究所的前身），从此混迹省直文艺界，后又参与河北省艺术学校（今称河北艺术职业学院）的筹建工作，且在此供职多年；再后来又担任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的主要领导工作，并与“样板团”的一些演员多有交往。可以说，我与“样板戏”厮守大半生，不仅从其起源、发展、兴旺、寂寞，再到今天的复兴，历经了“全程”，而且亲历、亲闻了诸多“样板戏”排演期间的奇闻轶事。面对近年来一些剧团由唱“样板戏”选段，到复排上演全出（如《沙家浜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平原作战》等），难以名状的心绪时时萦绕心头，脑际间不由涌现出当年排演“样板戏”的一幕幕情景。

◇ “样板戏”的称谓是谁最早提出？“八大样板戏”究竟指哪几个？

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“样板戏”称谓的来龙去脉。

“样板戏”于文革期间正式命名，始作俑者是康生。1966年11月28日，在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（简称“中央文革”）召开的万人参加的“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”上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宣布：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海港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，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，交响音乐《沙家浜》等8部文艺作品为“革命样板戏”，这8个演出团体为“样板团”。这是“样板戏”一词的最早出处。不过，将《红灯记》称为“样板”，时间更早一些。1965年春《红灯记》到上海演出，3月16日的《解放日报》就发文称《红灯记》是“一个出色的样板”，但这时还没有“样板戏”的称谓。1966年至1967年，伴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深入发展，“样板戏”的演出更为红火，“样板戏”一词出现的频率更高，几乎充斥了全国的报纸、传单、造反小报和广播（当时电视尚不普及），国人皆知。

1967年5月，为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25周年，江青、康生“钦定”的8个“样板戏”全部调进北京，举行盛大的“革命样板戏大会演”。“两报一刊”（指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军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）大力宣扬，既发文章又发社论，还发表了3年前即1964年7月江青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《谈京剧革命》，将“样板戏”的宣传推向了极致。1967年第6期《红旗》杂志发社论《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》称：“京剧革命，吹响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。”“样板戏”“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，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，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‘斗、批、改’（‘斗、批、改’三词是文革纲领的缩称，出自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，即《十六条》。原文是：‘在当前，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，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，改革教育，改革文艺，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，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。’）的优秀样板。”权威刊物将“样板戏”提高到这样的高度，便使这一原本就很难量化并缺乏科学性的名词，涂上了浓重的政治彩色。亦即是说，“样板戏”不仅是戏，更是政治。

现在人们口头说起抑或当年报刊上宣传的“样板戏”，笼统地称“八个样板戏”或“八大样板戏”，但究竟是哪“八出”却说法不一。当时“官方”“钦定”的“八出”，即康生宣布的那“八出”，是第一种“版本”；第二种“版本”是1995年2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八大样板戏（珍藏本）》一书，该书刊出的“八出”是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海港》、《龙江颂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，现代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白毛女》，并将京剧《平原作战》和《杜鹃山》作为“附录”刊后，示意《平原作战》、《杜鹃山》不在“八大样板戏”之列；还有一种“版本”是将《杜鹃山》、《平原作战》和钢琴伴唱《红灯记》也列入“八大样板戏”……名目繁多，众说纷纭。

现在无论怎样从那十多出“样板戏”中归拢出“八出”，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，也不会再被强加上“破坏样板戏”的罪名。我感到，在“八大样板戏”是哪“八出”问题上，之所以出现提法上的差异，是因为看这些剧目的角度不同。康生宣布那“八出”时，是在1966年11月，当时有些“样板戏”还未出台，当然他不会提到，这是从时间上说的；后来又出现了几出，如《龙江颂》、《杜鹃山》，其影响远远超过交响音乐《沙家浜》，所以现在人们提到“八个样板戏”，就很少涉及交响音乐《沙家浜》了。

戏剧界对“八大样板戏”的说法，有个不成文的“共识”，即认为按时间顺序上说，康生说的那“八出”，是“第一批样板戏”，而在1970年以后出现的京剧《龙江颂》、《杜鹃山》、《红

色娘子军》、《平原作战》以及《红嫂》、《磐石湾》等，称为“第二批样板戏”。不过，平心而论，在这第二批中，除《龙江颂》、《杜鹃山》的水平和影响尚可与第一批比肩外，其他几个就逊色多了，有的甚至已被观众遗忘。比如说京剧《平原作战》，表现的是抗日战争中毛泽东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的思想，主题是积极的，但那些剧情都是从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和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的有关情节中拼凑起来的，没有什么新意，人物形象也干干巴巴。只是主要演员李光（扮赵勇刚）、李维康（扮小英）、高玉倩（扮张大娘）有上乘的表演，成为“人捧戏”，才使该剧有了一些影响，及至今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，又由中国京剧院复排上演。这次复排演出，我从电视转播上看过，从唱念到表演，都是一种模仿，较之“李光版”又差了一大截。通观“样板戏”的称谓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即30多年来，“样板戏”一词只见于领导讲话、报刊发文和口头流传，而正式出版的“样板戏”剧本、舞台演出字幕和“样板戏”电影字幕上，均称“革命现代京剧”和“革命现代舞剧”，而从不用“样板戏”一词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些地方还保持着一定的严肃性和科学性。我在河北省艺术学校工作多年，师生们演出“样板戏”时，我常和教务处的同志商量，咱们的字幕上就写“革命现代京剧”和“河北梆子现代戏”，不要用“样板戏”一词，因为“样板团”演出时的字幕上也不写“样板戏”。多年来省艺校就这样做了。

◇ “样板戏”全国大普及，戏曲院校教材“样板戏”成为唯一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“样板戏”作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现象，其普及程度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，当时的坊间俚语“八亿人民八出戏”，即是生动的印证。1967年春，“样板戏”已成为“独放”的“一花”，是年5月1日，“八个样板戏”齐聚北京举行大会演直到6月中旬，历时37天，演出218场，观众达33万人。当时看“样板戏”，是我供职的戏研室的一项业务，也是政治任务，自然对这次大会演特别关注。单位领导派我提前到北京买票，戏票搞定后再招呼同事们赴京观看。当时戏票非常难买，天不亮就得到位于前门大栅栏的一个售票点排队，长长的队伍拥挤不堪，临到窗口时挤得喘不过气来，若非年轻力壮绝不能胜任。拼死拼活总算买到了两场票，后又通过“样板团”的朋友搞到几场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这样，会演中我一一看了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海港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。记得在看中国京剧院的《红灯记》时，开演前主要演员（绝不要反面人物）一律着戏装站在台上，手捧《毛主席语录》贴在胸前，和观众一起唱《东方红》，唱毕才开戏。戏结束时，主要演员又带妆站在台上，在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高唱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反复唱，直至目送观众退场毕，演员才退回后台卸妆。这种做法影响到全国。当时省会石家庄演“样板戏”时，也大都这样做，很多时候演员不仅高唱着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目送观众退场，有时还手拉手把观众送出场外，然后才回去卸妆。北京的这次会演，影响极大，6月17日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观看了《智取威虎山》，6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发社论，发出了“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”的号召。

文革期间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，在民众的心目中，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，就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。所以，“把样板戏推向全国去”的号召一发出，全民开始学唱“样板戏”，上至耄耋老人，下迄几岁的孩童，不论有嗓无嗓，不论五音全不全，大都能照猫画虎地唱出几段“提篮小卖拾煤渣”、“临行唱妈一碗酒”、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”、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”等等。甚至连《沙家浜》中戏极少的配角沙四龙那四句（西皮快板）“四龙自幼识水性，敢在滔天浪里行”，许多人也学唱不误。至于《沙家浜》中胡传魁唱的（西皮二六）“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”，在车间地头更是随处可闻。可以说，“京剧样板戏”全民大普及的程度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。你还别说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大普及，在工农兵群众中还真出现了一批好演员，后被选拔到专业剧团。业内人士都知道，剧团的演员讲究幼工，京剧演员一般十二三岁进戏曲专科学校“坐科”八年，打下扎实的唱、念、做、打（表）基功，演唱风格上还要分“流派”。然而，从工农兵中选拔的演员，仅是凭着一条好嗓而来，没有幼工，更无“流派”可言，进剧团后只好补学身段表演；因其进团时大都在20岁上

下，有的已近30岁，重学武功已不现实，只好在身段表演上修修补补，所以上台表演时往往被行家称为“老斗”（斗读d o u，不会表演的意思）。当然也有出类拔萃的。

在全民大唱“样板戏”的同时，全国范围内的专业剧团又大办“样板戏学习班”，地方剧种的剧团纷纷组建“移植学演样板戏”的机构，就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舞团也以维吾尔歌剧形式移植了《红灯记》。这样的移植机构全国计有数百个，仅河北即有33个之多。当年，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移植的河北梆子《龙江颂》因突破唱腔设计禁锢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成为该院的保留剧目，社会影响很大，至今舞台上还常演出江水英的唱段。石家庄市丝弦剧团移植的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保定地区老调剧团移植的《红灯记》，邯郸地区平调落子剧团移植的《红色娘子军》，唐山市评剧团移植的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当年我就看过多次，也都有一定的水平，至今印象很深。加之当时“样板戏”剧本破天荒地在“两报一刊”发表，报刊上的“样板戏”剧照铺天盖地，使“样板戏”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生活“热点”。那种“热度”，可谓空前，也可以说是绝后。

1970年夏天，我被从正在劳动改造的隆尧县唐庄干校抽出来，参与河北省艺术学校的筹建工作。参与筹建的还有牛树新（原河北省戏剧学校副校长、延安平剧院研究员、京剧《三打祝家庄》中顾大嫂的首演者，1984年病故）和郭阳（原河北省戏剧学校语文教师，1984年病故）。我们三人奉命去省革委政治部领任务，负责这项工作的杜荣泉同志发给我们每人一本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》，并提出了具体要求，我们即到正在平山县中学搞斗、批、改的省梆子剧院座谈、搞方案。

至1970年底，办校方案经上上下下反复修改方定；另一条战线的招生工作也结束，很快就开学了。因为新校舍未建成，此后两三年的时间内省艺校借住河北师大数学楼。12月28日新生入学那天，无论男生还是女生，都是十二三岁（这个年龄段，依然沿续几十年来戏曲学员的坐科学龄，因为再大了，就练不出武功）。入学那天当晚，在河北师大风雨操场开“迎新晚会”，孩子们都会唱，男孩子们唱“临行喝妈一碗酒”、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”、“早也盼，晚也盼”；女孩子们唱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”、“八一三，日寇在上海打了仗”，不仅是那么个味儿，而且连行当各自也已选定了。戏曲班的100多名孩子，大都来自农村，入学前就都能唱两口，可见当年“样板戏”在农村的普及程度。这届学生中的邹立功，来自饶阳县，形象颇佳，嗓音洪亮，听他唱京剧“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”，字正腔圆，很有韵味。只是开学后分班时，把他分到了河北梆子班。毕业后他改行经商了，现任河北省政协中山宾馆总经理。

文革期间，传统戏俗称“老戏”，一律被斥为“封、资、修”，大加挞伐，演传统戏的演员多数被批斗，谓以前演传统戏为“放毒”。1969年冬，我们从唐庄干校到柏乡县搞斗、批、改，有一天在县礼堂演节目，让省戏校教师、著名评剧演员曹芙蓉上台唱一段，曹上台后第一句话就自诬“我过去净放毒了”，所以省艺校京剧、河北梆子班的学员自然而必须地只能学演“样板戏”，而不能奢望其他，甚至谈传统戏而色变。当时我在省艺校办公室工作兼上文化课，文化课的教材也是清一色“样板戏”剧本，而不能讲其他剧本，也没有其他剧本。我先后给学生讲了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等剧本。公正地说，在学演“样板戏”的热潮中给学生讲“样板戏”剧本，这对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剧情和唱词的理解是有帮助的。

京剧、河北梆子班的老师，大都是老教师，许多人过去又是著名演员，教“样板戏”虽说是个“新活儿”，但他们提前学一步，就算“现趂现卖”，教起学生来也得心应手。在我的办公室兼排戏课堂上，我常常是一边办公，一边听著名京剧演员刘会琦老师给京剧班学生教唱《沙家浜》选段。她按照“样板戏”中洪雪飞（饰演阿庆嫂）的唱腔，一丝不苟地教练，仅“授计”一场中阿庆嫂的那段（二黄慢三眼）“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”，就教十天半月的，抠得极细，就像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每晚的“跟我学”节目一样。京剧班老师教《沙家浜》、《红灯记》、

《智取威虎山》，完全按照“样板戏”的标准曲谱；河北梆子班老师照省梆子剧院移植的梆子曲谱，不走样地教唱。学生进展都很快，也培养出不少著名演员，而今活跃在舞台上的河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、省政协委员张艳玲，省梆子剧院院长李建锁、一级演员王云菊、一级编剧王新生，都是这一届的毕业生。当时时兴“开门办学”，师生把广阔农村当课堂，在饶阳县五公村，在赵县南解疃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在这些地方，白天参加农业劳动，晚上义务演出“样板戏”，群众非常欢迎。有时哪个地方演得与“样板戏”不大一样，老乡们还给提出来。

教学剧目不敢言传统戏，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却是依照“祖宗之法”进行基本功、毯功、武功、把子等的训练，不如此，就培养不出幼功扎实的演员。“样板团”的演员也都是这样训练过来的，不然他们也演不好“样板戏”。基本功的训练无所谓“样板戏”、“传统戏”，教基本功也不会有“破坏样板戏”之嫌，所以老师们在课堂上完全放得开。也正是学生们有了一定的基本功，所以才能胜任“样板戏”的演出。

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其后的两三年内，戏曲院校的教学上，戏曲舞台上，仍是以“样板戏”为主，“传统戏”只是偷偷地开放。当老师们拿出劫后余存的靠旗、马鞭、厚底靴，学生们像见到“出土文物”一样的惊诧。1979年2月5日至22日我到北京参加全国艺术教育会议时，许多省、市、区的戏（艺）校领导还在私下互相打问传统戏教学在整个教学中所占比例问题。新疆艺校的一位领导对我说：“我们教学中的传统戏占30%，你们河北呢？”我说：“还没有什么安排，看上边的要求吧！”这次会议后，传统戏教学才逐渐开放，戏曲舞台上的传统戏也逐渐上演了，“样板戏”热开始降温。

◇ 学演“样板戏”不许“走样”，违者以“反对‘样板戏’”罪名论处

一出戏的剧本，是剧作者完成的一度创作。至于剧本怎样处理，音乐怎样设计，演员如何表演，舞台怎样装置，那属于二度创作，都是根据剧团的实际情况和演员条件而定，不同剧团和不同的演员在同一个剧本的处理上往往是不一样的，也不可能完全一样。比如据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撰《玉堂春落难逢夫》改编的京剧《玉堂春》，自清代就有演出，梅、程、荀、尚四大流派都擅演，但风格各异。在《起解》一场中，这四派均唱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，而“张（君秋）派”却唱“低头离了洪洞县”。行家、观众不但不认为“张派”“不标准”、“走了样”，反而感到这是不同流派的不同特点。再如同是演“水浒戏”中的林冲，京剧演出戴“倒缨盔”（即清伶杨小楼创造的“林冲盔”），而昆曲演出却戴软罗帽。观众一看这不同的盔帽，不用听唱腔就分清了剧种。我们看到的大批传统戏，正是因为遵循了艺术规律，尊重了不同流派的特点，才有了戏曲舞台上的流派纷呈，异彩多姿。

这种情况不必扯得太久远，就是“样板戏”确立之前的同一剧目，也允许有各自的唱念做打和舞台调度。这里只说后来极尽红火的《红灯记》。这出戏的题材来自于电影文学剧本《自有后来人》，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之拍成故事片后，影响很大，许多戏曲剧团争相以此为题材编演现代戏。我当时就知道哈尔滨市京剧团、上海爱华沪剧团、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都据此改编成不同剧种、不同风格的《红灯记》；而后来成为“样板戏”的中国京剧院的《红灯记》，即是由翁偶虹、阿甲根据沪剧《红灯记》改编的本子。1965年秋天，时为河北省戏曲研究室编辑的我，曾在邯郸市看过河北梆子剧院自编自演的《红灯记》（那晚李先念副总理也在剧场看戏），高明利扮李玉和，齐花坦扮铁梅，路翠阁扮李奶奶，可谓名家济济。这出戏的唱念与后来的“样板戏”大不相同。记得李玉和被捕后在狱中有一（安板）段唱：“老人家莫要悲痛莫心酸，报仇雪恨总有那一天。”铁梅在狱中也有一（二六）段唱：“抬头望断南飞雁，低首思亲眼望穿。”这些虽无豪言壮语但充满深情厚意的唱段，优美而深沉，后来在按“样板戏”重新移植后，不复存在了。

本来，各剧种不同版本的《红灯记》，按自己的条件和风格演出着，就很好，但自京剧《红灯记》“钦定”为“样板戏”后，各剧种必须照此移植，而在移植过程中却严重地破坏了艺术规律，有的甚至还因此带来种种灾难。对于学习移植“样板戏”，1971年初的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文汇报》都明示“地方戏曲移植革命样板戏是一场革命”，要求各地方剧种“在‘样板戏’创作原则指导下，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”。并严格规定，学演必须“不走样”。上海越剧院排演《龙江颂》时，于会泳就下达过中央文革指示：“词儿一个也不能改，调度一点也不能动，就是唱腔用越剧的，其他都要按京剧原样来演。”有了“不走样”和“按京剧原样来演”，各地方剧种不得不违背自身的剧种特点，使地方戏难以发挥自己的唱腔特点，甚至有的变得不伦不类。在以“样板戏”创作原则“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”的指令下，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只好对原来演出成功的《红灯记》推倒重来，按照“样板戏”的模式重新移植。表演上还好说些，按“样板戏”的路子走就是了，但唱腔却是个难题。因为河北梆子唱腔和京剧唱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声腔体系，“不走样”实在难办。音乐设计人员只好按照梆子的板式硬套：京剧若是（导板），梆子就用（尖板）；京剧若是（散板），梆子也用（散板）；京剧若是（西皮三眼），梆子就用（大慢板）。在节拍上，京剧若是4小节，梆子必须也是4小节，不得越雷池一步。要达到这样的效果，设计人员只好掐着秒表来设计唱腔，不能长，也不能短。这种设计方式，现在听来很可笑，但在当时却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。这样做的结果，不仅束缚了创作人员的创作才能，而且设计出的唱腔总带京剧味。这也是把戏曲唱腔“政治化”带来的恶果。当时，有一位在唱腔设计上造诣很深的专家气愤地说：音符有什么阶级性，哪个阶级的音乐不都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吗？这样的言论必然招致祸灾，遭到批斗。

在“不走样”的艺术桎梏下，排演“样板戏”的演职员人人自危，生怕在哪个关节上，一不留神儿出现差池而招来祸端。比如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，打了几块补丁，补丁补在什么地方，有多大面积，各剧团、各剧种的李铁梅的上衣，必须完全一样，否则就是“破坏‘样板戏’”。1974年，河北省艺术学校京剧班师生排演了第二批“样板戏”中的《杜鹃山》，在农村和石家庄多次演出。有一次在石家庄八一礼堂（现已改建为“世纪大饭店”）演出，我负责“跟幕”，亲睹了舞台工作人员风声鹤唳的紧张情状。这出戏的第四场叫“青竹吐翠”，剧本中关于这一场的布景提示是：“新竹泛绿，青翠欲滴；杜鹃盛开，绚丽多彩……”舞台队的一位极细心的老教师，因多次观摩过“样板戏”，记下了舞台上的许多细节，这次演出她回忆起“样板戏”《杜鹃山》布景上的杜鹃花是54朵，生怕我们学演的《杜鹃山》“走样”，开演前她就急匆匆地在台上一朵一朵地数，看是不是54朵。数的结果是54朵，她才长长吁了一口气。其实，李铁梅上衣的补丁补在哪儿，有多大；杜鹃山上的杜鹃花有多少朵，完全可以依据演员的身材和舞台的大小而定，没有必要这样严苛。再者说了，《红灯记》剧本关于剧中人服饰提示上，并没注明必须是多大的“补丁”。补丁大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补丁小也是穷人家的孩子；《杜鹃山》剧本关于布景提示上也只说“杜鹃盛开，绚丽多彩”，也没注明必须是多少朵花。54朵花叫“绚丽多彩”，53朵也可叫“绚丽多彩”。这就像传统京剧《空城计》中诸葛亮所用的“城楼”，不同剧团演出时大小、高低各不同，不也很好吗？话是现在这么说，在当年是万万不可出此言的。

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年代，无论是排演“样板戏”，还是移植“样板戏”，因稍有不敬的言论或“走了样”的舞台演出而被扣上“反对‘样板戏’”罪名的情况，多有所见所闻。东北某市有个京剧团演《红灯记》，演到第六场“赴宴斗鸠山”，剧本规定情景是：日本宪兵队的伍长将李玉和拉下去受刑，但李玉和宁死不讲，伍长复上场后向鸠山道：“报告，李玉和宁死不讲！”鸠山道：“宁死不讲？”伍长：“队长，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！”鸠山：“算了。共产党人机警得很，恐怕早就转移了。”可能是由于扮演伍长的演员过于紧张，他复上场后说成了：“报告，李玉和招了！”扮鸠山的演员一听满拧了，但他很机灵地来了个“救场”：“招了？不可能吧？算了……”演出结束后，扮伍长的演员以“破坏‘样板戏’”罪名被定为反革命，遭长期批斗。应该说，扮伍长的演员是严重的失误，但“鸠山”的“救场”已经“救”过来，接受教训也就是了，不至

于被打成“破坏‘样板戏’”的阶级敌人遭批斗。上海郊县的一位乡间戏曲艺人，因学演“样板戏”时加进了一些“噱头”笑料，即被定为“现行反革命”判处死刑。北京有位舞蹈专家，在为“五七干校”学员排演《红色娘子军》时，因舞台小，难以按“样板戏”的原样排演，只得将舞步稍加改动。就这么一点改动，竟被扣上“破坏革命样板戏”的罪名，对之进行残酷迫害，那位演员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被迫自杀。——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真人实事。这许许多多的冤案，揭示出“四人帮”极左文化专制在文革时期横行肆虐之一斑。

不过，在“天高皇帝远”的情况下，出现对“样板戏”不恭的表现，也就无法问咎了。我的家乡冀中蠡县爱唱戏，文革时许多村镇仍有民间剧团，当时也只能演“样板戏”。记得1968年春节我回家探亲，村里来了潞龙河南岸某村的一个剧团，头天晚上演《沙家浜》，演胡传魁结婚那场戏时，竟增加了一个打扮妖冶的女子舞着绸子满台跳舞；胡传魁和刁德一也不知穿的什么部队的服装，两个人还都戴着眼镜，他们可能认为凡大官都戴眼镜吧。念白是满口蠡县话，至于低八度的唱腔更听不出哼的什么。第二天晚上演《红灯记》，所有演员的服装都是农民常穿的衣裳。李奶奶、铁梅穿什么，戏装和农民衣裳不好分也就罢了，这还能凑合，但也让日本宪兵队的侯宪补穿着农村男式对襟小棉袄，留着寸头，不戴帽子，脖子上围着白毛巾，左腋下还夹着一个60年代办公用的硬纸板做成的文件夹，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。——这样学演“样板戏”，如在城市必然会被抓起来，但在穷乡僻壤却安然无恙，老百姓看后一笑也就拉倒了。

当年，坊间还有一些传闻，说来也很有意思。如说某剧团演《智取威虎山》时，第六场“打进匪窟”，剧本规定是——座山雕：“脸红什么？”杨子荣：“精神焕发！”座山雕：“怎么又黄啦？”杨子荣：“防冷涂的蜡！”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可能由于太紧张，这段对话的台词变成了——座山雕：“脸红什么？”杨子荣：“防冷涂的蜡！”座山雕一时没反应过来，照问不误：“怎么又黄啦？”扮演杨子荣的演员一听，第一句说错了，又不能收回，遂改口现编词儿：“又涂了一层蜡！”另据闻一个区级剧团演《红灯记》，在“刑场斗争”一场，铁梅在监狱中见到了李玉和，李玉和欲道明他与铁梅的关系，即他不是铁梅的亲爹，按剧本唱道：“有件事几次欲说话又咽，隐藏我心中十七年。我……”这时铁梅打断李玉和的唱，应急忙说：“爹！你别说了，您就是我的亲爹！”据传扮铁梅的演员看到台下有某大人物看戏，紧张过度，竟说成了：“爹！您别说了，我就是您的亲爹！”这些带有某些调侃的“版本”，现在很难查实。其实也没必要查实，它们之所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，或者是由于“不许走样”原则搞得演员非常紧张，把台词说错了，这就是人们生活中常说的“越怕越出错”；或者是观众出于对“不许走样”文化禁锢的不满而演义出来的。

在排演“样板戏”整个过程中，不仅是学演、移植不能走样，而且江青横行霸道，颐指气使，对原“样板戏”的编演人员稍有不从，也以“破坏‘样板戏’”治罪，“卸磨杀驴”，睚眦必报。如著名导演阿甲，是“样板戏”《红灯记》的主要创作人员，既是导演，又是编剧之一，他早在1938年于延安时就与江青同台演过反映抗日的京剧《松花江》，（套用的传统戏《打渔杀家》的形式），阿甲饰父亲，江青饰女儿。由于他在《红灯记》修改过程中几次抵制过江青的不合理意见，竟被打成“破坏《红灯记》的反革命分子”，遭残酷迫害达十年之久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，1928年生，祖籍河北，7岁登台，15岁出名，曾与杨宝森、金少山、马连良、侯喜瑞等京剧大家合作演出，蜚声剧坛。1964年她在《沙家浜》中扮阿庆嫂，一炮打响，毛泽东看戏后称许“阿庆嫂演得好”，并说“你是京剧阿庆嫂的第一个扮演者”，后遂有“第一阿庆嫂”之誉。开始江青对赵燕侠关爱有加，甚至还亲手剥糖块放到赵的嘴里。后来江青送给赵一件毛衣，赵看不惯江青的横行霸道、反复无常的作风，借口自己体胖而未穿，江青遂派人将毛衣取回。对“不识抬举”的赵燕侠，再演“样板戏”《沙家浜》时，江青坚决把她拿掉，换上了昆曲演员洪雪飞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（1919—1975），河北霸州人，工武生、老生，1938年拜“余派”名家余叔岩为师，武生又宗“杨（小楼）派”，文武兼备，无人能比，1964年他作为A角李玉和，主演《红灯记》，饮誉京华。当时钱浩梁（文革中江青为之更名“浩亮”）只是B角。只因当时设计《红灯记》唱腔的李少春有自己的主见，

没有听江青的瞎指挥，江青便找个托词指责李少春，说他扮演的李玉和“没有工人阶级气魄，不像个工人”，后换上了钱浩梁。……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。在十几个“样板戏”中，大都是凭江青的一句话即主角易人，前者被一棍子打入地下，后者一步登天。如此这般，广大观众就只知“样板戏”中主角的大名。其实，公正地说，现在“样板戏”中那些主要演员的艺术造诣和演艺水平固然不错，但若让被换下来的赵燕侠、李少春等名家来演，一定不会是“样板戏”演员之下。

□ 《文史精华》2005. 11

~~~~~

## 【文革文献】

###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(1967年12月1日)

• 陈再道 •

向毛主席请罪！ 向大家请罪！

我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犯了罪，执行了刘邓路线，以致造成了罪过。我犯这么大的罪，这么大的错误，毛主席还一再宽大，教导，还希望我回头，不要坚持错误，认真的改正，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，还可以站起来。毛主席最近又指示，叫我“好好学习，重新革命”。党中央、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，也是很宽大，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，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，斗争也好嘛。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，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，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，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。所以，我应该低头认罪，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，重新革命。在我来说，就是重新做人。我这个人，已经是敌人了，已经坏了，修了，应该是重新做人。脱胎换骨，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，向林副主席、周总理、中央文革请罪，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，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。我是反革命，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还想我真心的回头。所以，我现在讲三个问题。

#### 一、 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

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总暴露，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蜕化变质，第二部分我再来讲（犯罪的根源）。

第一，我养病休息一年多，去年九月回来，回武汉，回来就参加省委会议，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，自己本来以前就是修了的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，回来也没有很好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、方针，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、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理解，一些政策、方针也没有学习，领会。一回来，因为我是省委常委，就参加常委会，就听张体学的，就跟张体学在一起了。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，一参加文化大革命，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，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，站到这个黑省委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。保省委，说省委有错误，但成绩是主要的，基本上还是正确的，总是在那里帮旧省委定调子，帮助张体学，说你们不要去活动（这也是帮助他）；要做的好看一点，隐蔽一点，都是站在省委这个反动立场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，坚决去向省委进攻，而是站在省委方面，怎么对付革命派，怎么样应付革命派。那时，革命派在省委绝食，送饭不吃，还照下相来。省委提出“高姿态，软办法，真狡猾，难对付”，这些反动的东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。都是打击对付造反派的，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。我跟张体学，他叫我就去，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，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。一次是武大，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视察的，九千人的大会，我去



了，这一次，我还讲了话，当然是讲意义了，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。一去就是保省委、镇压造反派的，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，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。省委礼堂欢迎南下学生，也有造反派，也有保守派，这个会我也参加了，这是一次。再有湖大保守派，开会纪念国庆，又说是发毛主席著作，这是在湖大礼堂开的。我参加了四次大会，很积极，都是站在省委方面，都是保守派方面，都是支持保守派，镇压造反派，压，帮助省委涂脂抹粉，包庇，助张体学的威。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，对付造反派。一次说报社被封，要撤职几个，罢官几个，我说要停职就停几个，先拿下来，以后再拿上去，这都是给省委出谋献策，搞不出革命的东西。帮助省委搞检讨，检讨一下就行了。讨论检讨开了两次会，保张体学，借房子给他住，把滨江饭店借给他们，开了几天会，还准备把洪山房子借给他们办公，干什么？就是把他们藏起来，掩护，保这个黑省委，支持他们的反动路线。站到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上去了。

保王任重。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，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黑枪手，点了，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，只是他错误严重，批判了以后再讲，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十二月，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，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去接他。就是派人去接他，问好！这是什么立场？资产阶级立场嘛，看这个鬼啊！他是敌人嘛，还是保他，助他的威。三月，王任重写信，当然也给了中央，也写给我、韩东山、姜一，要转给省里干部，那个信就是抱着成绩不放，什么检讨？就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，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，自己有错误，但不是三反性质，说湖北要是反革命领导，能够增产，能够搞好？那不是刘少奇的理论，信上都有。我们以后把这个信打印发到省直，我们没有组织批判，这不是保他？

而且我们给他写了个信，也说他这个检讨，抱着成绩不放，很不深刻，没有触及灵魂。写这个信，还写了个“同志”，这是明目张胆地保王任重。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么，为什么还写个“同志”，所以，这是个立场问题，站到他那个立场上去了，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。站在革命的立场，他是个敌人，就应该和他坚决斗争，应该揭发他，应该斗争他。所以，我保省委，保张体学，保王任重，参加了一些活动；起了极坏的作用，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动立场上，来对付造反派，帮助省委出谋献策。跟省委一起坚持反动路线。这是我九月份回来后，到一月这个阶段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第二，镇压革命造反派。一、二月会议以后，这个阶段。这次会议，贯彻的就是自己的，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。为什么镇压呢？因为我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，已经蜕化了，已经很多问题了。李迎希起来，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，有些联系。司政机关起来了，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，腐化堕落，生活糜烂，所以就不革命，就怕，怕革命。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，旧的很多，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，就是怕革命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，暴露在群众的面前。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，抓革命生产促生产，借口李迎希是扒手，野心家，拼命打击造反派。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，怕革命，到反革命。这次回来什么不做，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、张广才是野心家，要夺军权，要把军队搞乱，活动了许多造反派，卫校啊，高级步校啊，文艺团体，凡是接近他们的，谈过话的，就说是有问题，乱污蔑，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。借公安六条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，认为不好就抓，所以就捉人。思想上就是想革命搞下去，打下去就是不革命，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，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，那是好的，反对我们的，反对我的，那就不行，就是要打击，有“我”字，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，那么坏，还挨不得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对造反派，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，就是要报复。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，来打击造反派，借着李迎希，借口稳定内部，部队不能乱，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，要随时保持警惕，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，解散组织。在生产方面，借口生产来压革命。生产要抓，现在春耕季节来了，自己就赤膊上阵，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。高级步校副校长，我就抓起来了么，卫校抓人我到了。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。除了我的意图，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，实行白色恐怖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围剿革命派，在军内捉了两百多，那时候说是一百七，把一些青年抓起来。“十六条”上说什么样的人都不能捉抓，就是

右派有问题也要在运动后期处理，所以违反了“十六条”，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完全是刘少奇、邓小平那样子，就是毛主席张大字报《炮打司令部》，打刘少奇的司令部，我们那个司令部，以我为主也是那样子的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围剿革命派，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。而且不是一般的，而是调兵遣将，用部队。那样怕，完全不是那个情况，你现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，你是真正革命的，那问题就好说得很多。你站在反动方面就看着他不好，要革你的命。所以现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，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，完全是采取白色恐怖，镇压，很恶劣，很毒辣，反革命很坚决。因为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，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，林副主席指挥的，有崇高的威信。我那时候就是修了的人，还没有暴露。所以，以后就镇压的更利害，就是在这些借口下面：李迎希要夺权啊！野心家啊！张广才啊！所谓稳定部队啊！促战备对付帝国主义啊！这都是假的，就是为了对付革命，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，镇压革命，打击造反派，报复。抓革命促生产啊！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“抓办”。因为这个“抓办”将来干部好，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。把坏人也搞进来，镇压革命，镇压的学校多了，还有北京管理的九个学校也采取了，这样办法，借口要支援北方，赶快搞整风，整风九天，总想赶快把革命镇压下去，打击下去，不是就没事了嘛！不打倒你了嘛！就是自己不革命，也不准人家革命，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。谁个要革我的命，要打倒，就是有气，就想办法要整。依照我们那样子，国家就不革命，资本主义就复辟了，就是我们复辟了。因为你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么。所以抓了九百人，解散了几十个组织，全省一百多，大抓人。再就是处理李、张，什么政治扒手啊！什么野心家啊！处理张竞的问题，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来，他们很好么，就是过去他跟李迎希他们说了一下，现在看，说得对么，说有两条黑线，军区一条，省委一条，这就是两条黑线么，这样就说他们不尊重领导，也是有野心，所以要停职反省，这都是我亲自做的。开会，我亲自参加的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，要打倒你，就是不满，就是报复，就是要整。参加省委大会，抓革命促生产，想搞生产高潮，鬼！那全是假的，就是借口这个东西开上层会议，就是光开那些当权派的会议，在省委开的有百把人的大会，在体育场开了三万人的大会，都是机关、省直、市委各个战线上的，各行业的当权派。这些会议我们的讲话，拿这个生产来压革命，歪曲事实，思想上就是还正在斗和还没有斗的人，给他们打气，向造反派示威。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、闫钧、姜一、夏世厚都塞进“抓办”，这些名单我在北京还是跟张体学商量提出来的，这不是有鬼啊！原封不动，还革什么命啊！把旧省委那些人搞出来复辟，把一些当权派，有严重问题，象张旺武是历史上自首了的，我知道，就是说过去由省委解决了问题的，是什么人解决的？是旧省委张体学、王任重解决的，到底是怎样解决的，自己就是认为过去历史问题解决了。都把这些拉出来，塞进办公室，不经过造反派，也不经过群众，这我们的罪多大啊！所谓成立“抓办”，以后，周总理去时，说抓办，抓办，抓办里坏得很。武汉的抓办，人武部领导的抓办，支持保守派，打击造反派，办反革命事情，这都是在我的意图，思想指导下面一系列都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，为了自己不革命，那里有反对就采取报复。批判“二八”声明，错误的批判“二八”声明，“二八”声明批判的时间那么长，已经是挑起群众斗群众，什么香花派，什么毒草派，已经把保守派势力搞了起来，跟造反派斗争，打击镇压造反派，特别是对于二司，打击二司，打击工总，为解散工总加罪名。还拉三新，说支持你，他们那个时候同意批判“二八”声明么。不是真支持，就是利用，挑起几派斗争，镇压真正造反派，为取消工总作舆论准备。不管批判“二八”声明怎么样，我负责，起了这么样坏作用。“二八”声明有什么错误？我们用解放军的名义，用毛主席缔造是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批判，这对革命派的打击是多大啊！

扶植保守势力，扶植三字兵，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，中等学校的三字兵，都是保旧省委的。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，有的跑出去了，基本上散了。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，彻底地争取瓦解、分化、那武汉的形势就不同了。我们承认它的组织，把它又恢复了起来，所以造反派二司、三新都说三字兵恢复，表示反动路线的猖狂，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，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。过去他保省委，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。在北京打电话说瓦解，说了又后

悔，就是要团结、教育、提高，准许人家革命。保守组织应该坚决瓦解，这才是革命的立场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，看他们保军区，保我们，所以就很亲热，就扶植，把它重新组织起来。说他干部子弟多。这是我们执行反动路线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。这个观点，我们从过去那个旧省委把它接过来了，还变本加厉了，比他们镇压革命，镇压造反派还厉害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办不到的我们办不到了，我们玷污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这个荣誉，这个威信。自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，自己不革命，利用这个东西来打击。所以，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旧省委做不到的事情，起不到反动路线的作用，我们起到了。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，比过去的省委还厉害。我这个资产阶级路线，造成的恶果损失，比过去那个旧省委还大，还恶毒，更厉害，你带枪嘛，有枪杆子么。发表“三二一”通告，解散工总，这是发展到了高峰，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，也不调查，也不研究。报告报了，没有批准就做了，解散工总，抓了工总的负责人。那个十六条、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，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，谁个叫我大批抓了？都反对么！我们采取大批捕人，解散工总，当然材料整了，我点了头么，说材料看不看，谁看那么多。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，对个鬼啊！一个都不对，就是反动的，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，镇压无产阶级，镇压革命，那你说的对罗，你站到革命方面，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，那就是反动透顶，那是实行白色恐怖。点头之后，准备汽车，牛怀龙独立师，还把罗孟刚叫来，叫后勤出汽车，先说抓二百，抓三百，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。这是什么革命啊！这完全是白色恐怖，是反革命专政。不管情况怎么样，这个罪我应该负主要责任。是你这个反动路线，是你点了头么。就是你干的，也不要推谁么，就是我的罪么。我们抓的这些人，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加紧批判“二八”声明来压工总，解散工总来压二司，打击造反派，一系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拉一派，打一派，拨弄是非，就是想把造反派一个一个的打下去。这是二月会议后，在武汉镇压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大破坏的时候。

第三，军委四月会议以后，这是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。十条命令、江青同志讲是爱民的，就是要纠正错误。我们参加这次会议，一个是讨论十条，一个是接受教训。要转变么。毛主席讲纠正错误发扬成绩，有错误就赶快改，改的越快越好。主席、林副主席、中央文革许多教导，都没有听进去。十条革命就是好啊。好啊，内心里这还得了啊，又要来冲啊，又要搞乱啊，自己做的这些罪恶事实，怕人反攻。不执行十条命令，不贯彻，不讨论，不认真执行，不检查方向路线错误。已经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，就是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。在内部也不说，在外部更不说。工总不平反，抓的革命群众也不放，组织也不恢复。说的要平反，要赶快放人，我们就是不坚决，放一点，留一点，说什么严重的不能放。有什么严重问题啊。就是继续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继续对抗中央，反对毛主席，反对毛主席的路线。拒不执行十条，不检查错误，工总不平反，抓人不放，组织不恢复，变本加厉，放一点人，恢复一点。说过去解散是对的，现在恢复是对的，放个鬼啊！过去就是错的，就是继续反动路线，不公开在群众中检讨，承认错误，更没有决心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。

钟汉华在北京，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，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，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，什么工总不翻案，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。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，害了下面，欺骗了广大群众、干部，江青同志批评我的“借势压人”。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。回来，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，这是造谣，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，我没有做，那你为什么不做啊？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，反动的思想，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，因此，回来也是这样做，工总不翻案，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，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。那时，百万雄师还不多，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，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，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，自己没有注意，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，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。回来后，言论、行动还是那些东西，这是我们的，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，这个就不同了，这是个大罪过，欺骗人哪！盗用江青同志名义，蒙蔽人，下面当真的，还有什么怀疑的。所以，这个恶果是很大的，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，不管是政治委员，也不应该顾及，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，公开辟谣。没有这样做。

在三级干部会议上，我作了个总结，继续坚持错误。五月份，我向主席、中央作了报告，也是错误的。错误的分析形势，歪曲事实欺骗上级，打击造反派，这个问题，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，那个时候，把等待他们觉悟，一面斗争，一面团结，那个团结是假的，就是人家一天喊捉“武老谭”，什么陈再道，“打倒陈大麻子”就是有气，心里恼火。对三新、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。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，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。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，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。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，就是肯定了批判“二八”声明没有错，应该么，解散工总没有错，不能恢复么。造反派大方向错了，我们大方向是对的，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，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。一种反动的论调。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，我们是对的，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，把好的说成是错的，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，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。所以这样一系列，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，说陈、钟不是三反分子，谁要喊打倒陈、钟就抓起来，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。我听到了没有，听到了，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，说我不是三反分子，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，听了就很顺耳。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，听了洋洋得意，不会打倒自己，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，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，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。在给毛主席、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，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，说孟夫唐、刘真站过去了，说是一小撮搞的，是反革命逆流，是复辟，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。这时，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，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，百分之百，一点不假。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，是一股逆流，搞资本主义复辟，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。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，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，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，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，变本加厉了，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，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，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，这是污蔑革命派。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。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，这是完全对的，你老坚持，你打击他，阻碍他，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，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。所以，这样子我们越坚持，想方设法调兵，把革命派当敌人，怕的那样。新公校事件，绝食斗争，到军区来要见我，我没有见，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。一回来我们就研究，把这个推翻，这事我主要负责，我把它推翻的，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，打击造反派。说冲击军区，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，把政委绑架走了，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，这是我们的罪过，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，就搞铁丝网，水枪、护具，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，说是防啊！怕杀啊。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，那就是怕的要死，恨得要命，陷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。但是，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、商量，还是可以来，我们就是不见，不谈就怕。就是想办法对付，就是哪里住个连喽！哪里广播是他的喽！以后到五月，百万雄师就起来了，推翻这个七条，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，这是我的罪责。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。写了个给张维荣（按，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）的信，把七条推翻，不作算。倒打一耙，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。

发表六、四公告，不检查错误，不执行十条，不平反。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，进一步定调子，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，不能翻案。这也对的，那也对的，存在缺点，强调没有经验，初次上阵，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。任务多，时间紧，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。继续对抗中央，反对毛主席的路线，继续打击造反派，进一步定调子，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，造舆论。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，我是军区的司令员，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，压造反派，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。而我们总是说他好，给他地位条件，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，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，不执行六六通令，搞动员，搞大规模武斗，就是我们挑起来的，挑起武斗，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，还说百万雄师好啊，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！执行个鬼哟，打得那么厉害，自己在鼓里头，说单方面打么，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，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，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。百万雄师杀人。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。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，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。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，我不通，我也没见过他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你的这个方针，你说了话还要你去，这是助长了也么，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，给他创造条件，培养它，

支持它。所以立场没有站正，一讲起来就抵触，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，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。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，我挑起武斗，鬼我也没有到过，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，我没见过。说他有许多好的，大方向是对的，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，是个革命群众组织，这就是承认，就是支持。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，别说口头的，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，坐到百万雄师方面。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，打的那么凶，那时都感到很好，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，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。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，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，还夸大，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支持保守派，打击造反派。坐在保守派方面，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。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，打了下去，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，省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，亮么，搞三结合么，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，我们也很欣赏，很同意，还去策划，叫他们亮，赶快亮。以后，省市这些保守组织，都跟百万雄师一块，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，以为很好嘛。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，还受批判，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。

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，这是主要的，还多喽。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，还是个胜利。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，害了干部，当然，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。

第四，“七二零”反革命事件。这个“七二零”反革命事件，这是历史上少有的，天大的事情，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、反革命、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，这是反革命的事件。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。这一次，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、斗争、批判，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，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，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，这是极端错误的；不出“七二零”事件，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，都在保我，都说了话么，为什么出了？我不知道，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，没有很好的认识。再一个，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，怪那些事，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。这是我一系列的…执行这个…造成的。但是还有旁的原因，旁的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。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，执行反动路线，反对毛主席、反对中央、反对主席路线，而且顽固的坚持，造了许多舆论准备，定了许多的框框，调过来欺骗下面，欺骗战士，欺骗群众；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，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？我们就听嘛！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。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，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，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，统一思想，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，工总不能翻案，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，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，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，是个很大的组织。他们抓防汛，复课闹革命，（本来）都是假的，还加以夸张，说这些都对嘛！方向是对的。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，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，加以扶植；对造反派方面，也定调子，说他们大方向错误，完全不照中央的办，不照社论上的办。什么冲啊抢啊，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，是来污蔑造反派，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，进行打击，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，扩大市场，争取人心，欺骗蒙蔽群众。这都是我策划么！“七二零”事件为什么起来？以前就有这个思想，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，蒙蔽了群众。以后听说错了，有方向路线错误，工总要翻案，（群众）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。长期这样，所以一下子翻过来，群众不愿意；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，中毒又深，下面受了欺骗。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，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、思想准备，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。

七月十四号，总理一来，就说毛主席说，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。（我）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，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，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，做好“百万雄师”的工作，也未传达，也未去做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，就是不重视，就是抵抗毛主席。以为我开的几次会，都是搞的那。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，主席又说了，（如）传达下去，这个力量会多大！这个反动透顶了，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。这不是反抗主席啊！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！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，你就是没有做嘛。所以，开了几天会，周总理讲了，不是真通。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，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，总是他（按，指总理）在讲，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，为什么叫送上去呢？总是思想感到他们

（按，指中央领导）看到那方面，没有看到这方面，没有看到全面。我在那里表态，心里总还是抵触的，不愿意坚决贯彻。所以，总理、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，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，不是真通，不是真想改，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，材料还要他们（按指中央）看看。意思呢？是想不要恢复工总。工总…在我思想上……，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，（实际）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，已经解散这么久了，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，有了这个谬论。继续对抗中央，对抗中央文革，对抗总理。就是不愿意贯彻。指示这么明确，这么英明、正确，就是抵触，不愿意办，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还在继续顽抗，而且公开对抗中央，反对毛主席、周总理这些指示，拒不执行。所以，“七二零”事件不是偶然的。

“七二零”事件一发生，那就晚了。“七二零”事件，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，必然的产物。独立师也是嘛，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！“七二零”事件发生以后，自己不挺身而出，不很快的站出来；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，四点指示是对的，应该挺身而出。那时候说，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，还没有公开，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，你们在外面听到的，那不可靠嘛，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，不怪你们，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，把责任推在中央，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。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，你怕什么嘛！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重要啊！自己就是那样，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，没有办法，束手无策。也就是抵抗，好象是我们有责任，也有旁的原因；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，没有一点阶级感情。“七二零”事件发生以后，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，根本就没有放在心。这么大的事，这么天大的事，这不是我一个头、两个头顶得了的，这个安全工作，首先我（还是）去开会去了，由X X X布置去了。但是“七二零”事件发生以后，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，没有放在心上，这是最大的罪，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。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！中央首长在你那里，你还不采取措施，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！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。

那个时候冲进来，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，他们也打了我，那就不说了，那是打错了。但是，这个时候，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，谢副总理叫我、钟汉华去，我就没有去，钟汉华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也是中央代表，我们没有挺身而出，没有很快去搭救（按：陈检讨时，王力已经被所谓“请假检讨”关起来了）。当时认为有人去，军区那里还有人么。自己怕死，这个反动的思想。过去说我是“七二零”事件的罪魁祸首，是我自己搞起来的，感到冤枉。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，一点也不冤枉。这确实确实就是我们造成的，策划的，做了许多舆论准备，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，还定调子蒙蔽群众。

搭救王力也不注意，自己挨了打，还把老婆叫来看，自己很注意自己。所以，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。一切为了自己，为了我。为革命的事情，为党的事情，为人民的事情，在身上很淡薄，没有了。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，没有无产阶级气味，没有无产阶级思想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。以上这些罪行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，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，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，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，我这样搞不打紧，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，广大的革命干部，广大的指战员，使他们犯错误，使他们受气，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，我们欺骗了他们，蒙蔽了他们。想方设法，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，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。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，扶植保守派，打击造反派，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，搞得乌烟瘴气，乌云盖天，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，以致造成这个“七二零”事件。所以我犯的罪大，对党、对革命、对人民、对我们下面的干部、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，极大的恶果。

我的罪恶滔天，请求审判我，枪毙我，杀一个头也不行，杀一百个也应该。

## 二、 我犯罪的根源

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，顽固执行、坚持反动路线，站在刘邓反动路线，镇压革命，这个不是偶然的，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，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，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，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，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，有的蜕化变质，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，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。我个人的一生，如果活着的话，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。自己就是蜕化了，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，量的增加，无产阶级的东西，革命的东西，慢慢少了，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，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，别的不说，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，自己不知道，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，胜利了居功骄傲，停止不前，贪图享受，就是由这里起的，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，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、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，还有我们呢？把党、把人民都丢开了，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，一天就是个我字、私字，我的思想慢慢变了，蜕化了，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，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，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，回来就搞设备。汽车、钓鱼、猎枪、表、沙发、生活方式极端腐化，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，根本不看。进城以后，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，看到那里有地毯，自己搞个地毯，买沙发，买餐具，炖什么果子酱，面包。都是学修的，自己慢慢就修了。思想慢慢腐蚀，生活糜烂，流氓作风，看见女同志，护士，就是流氓习气，动手动脚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。生活糜烂，乱搞女人。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，污辱人格，连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上都有么，却都是犯了。我这么高，这么老，不象个人样，哪个爱你哟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，这么大年纪，丑得要命，自己还腐化堕落。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，在那里一天吃、乐、玩耍，对于工作，对于人民事业，为人民服务，老三篇看了，都没有做，都违犯了。人民为我，多少人为我服务，自己还不做工作，革命事业心没有了，淡薄了，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跳舞啊！前年在上海，还看什么家具厂，想买什么好家具，买桌子，椅子。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，忘本了，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那么有兴趣，那么牵心。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，为享受。住房子要好一些，坐汽车要好一些，钓鱼杆子要好一些，沙发、地毯……什么都要人家服侍，还不称心，还要训人家。主要指示出来了，官做大了，钱多了，架子大了，当官做老爷了，就是修了，不平等待人。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，读不进，没有读，毛主席的话不听，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，你不犯错误，不摔跤子？那是一定的。到那里去，毛主席的书带着，带着不学，做样子，学也没学进去，学了也不会用。就是贪图享受，到那里就玩，斗志衰退。我是一个忘本，一是啃老本。今年一月份，毛主席说，不要啃老本，老本有毒。这些教导都不听，多么重要的指示，不读毛主席的书，不听毛主席的话，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你不栽跟斗？所以，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。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，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。就是蜕化变质，堕落腐化，背叛了无产阶级，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，我是个孤儿，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，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，欠碗饭吃啊。革命不是靠毛主席，靠党，哪里有今天？

毛主席的指示，主席的话不听，主席的指示不照办，不贯彻，不学习，不研究，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。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，今年一、二月军委会议，四月军委会议。主席、林副主席、周总理、中央文革的首长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，作了不少指示，就是不听，听不进去。特别是今年一、二月会议，就是说乱了，就看了表面现象，就是听不得了，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陈伯达同志的报告，还要其他的报告，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。什么实际问题，就是怕，就是不好好领会，好好学习。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，研究、贯彻，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，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坚持错误不改。四月会议，制订的十条，就没有很好地执行，就对抗。蜕化了嘛！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，夜里送去，让在门外念，还发脾气，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也不看，到了什么程度。今年四月，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，叫把河南、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，自己不好好的抓，没有好好做，也没有向中央报告，向主席报告。四、五、六月这个时期。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。都没有很好的研究，引起我们的警惕。批广州、济南的就是看了，也没有听进去。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，该死啊！（略）



不听林副主席的话，对抗林副主席。六四年底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，多么重要，多么英明，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，搞大比武，听罗瑞卿的，很积极。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，自己就抓的不紧。罗瑞卿搞大比武，自己是很积极的。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，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，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，帮罗瑞卿，说什么叶群、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，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。拼凑尖子，弄虚作假。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其实很严重，我们不知道，自己官僚主义，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，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。一天在那里搞练武，拼凑尖子，日夜练，不搞政治，单纯军事观点，冲击政治。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。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。还提出林副主席的报告中，某些字句要修改。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。某些词句，就是指的拼凑尖子，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，好象还有成绩。那么会议上，当然其他人不说了，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，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，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林副主席的指示，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。说八条是过瘾的，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，如要站在左派一边，阶级斗争，自己要革命呀，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，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，这些指示就不听，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。你自己资产阶级，不革自己的命，人家就革你的命。这是必然的，不听主席、林副主席的话，非跨台不可。不是一次、两次，一次不改，一次不听，那多么危险。

对中央文革不尊重。老实说，不是不尊重，就是有抵触情绪，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，这是心里话，现在不要再藏着。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！总参谋部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做出了卓越的功勋，做了伟大的事情，立了伟大功勋。这个问题，过去有人讲过，自己不看这些事情，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，就是反对中央革命。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，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，我们提意见，要讲阶级，讲成分，不能唯成分论。对那一段讨论时，提意见，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，我们态度不好。血统论这个问题，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，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。批评反动的血统论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所以，对伯达同志报告时，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。讨论提意见是对的，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。（略）说他们不听我们的，只听革命小将的。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。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？说不答应。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，不合乎自己，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。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，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。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，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，调个把去，文革多搞些人，那个地方学校多，工业多的城市，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。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，我们来做工作，你们掌握。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，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，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，报告你又不批，也不批，也不指示。什么提意见，胆大妄为，反对中央文革。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，脱离实际，当官做老爷。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，怕这怕那，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，怕群众，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，要到群众中去，把文化大革命搞好。要相信群众，依靠群众。我们呢？不相信群众，到怕群众，以后要镇压群众，实行刘邓的那一套，反革命的反动路线，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，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，所以一斗争激烈，自己就藏起来。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，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。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，懒惰，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，没有革命事业心，一天就是为我，吃、乐、玩耍，不到实际中去，也不到群众中去。不说地方，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，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，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。作风非常恶劣，听不进反面的意见，说反对我更不行。受我们训的人不少。为什么呢？没有道理。自己那么懒，不做事情。为什么训呢？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，并不是为革命，为工作。所以说我主观片面，骄傲自满，目中无人，老虎屁股摸不得，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。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，怕群众，不革命。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，群众喊打倒你，就怕揪走，就不敢见。“七二零”事件也证明，也是怕死。

我们党委工作，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，都黑了，是我搞坏了的。我这个班子，把大家带坏了，害了大家，也害了下面。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，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，作风不



民主，就是自己说了算，人家说了不算。政治空气很稀薄，政治原则很差，对上面的东西，就是当了个交通，当了个收发，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，认真贯彻，认真执行，认真检查。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，我的错误就怕人揭，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，压制，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，一致，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。班长坏嘛，错误那么多，怕人家揭，怎么去搞思想斗争，怎么去搞思想斗争，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，来批判。所以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，由于我这样造成的，大家都是一致的错。当然，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。但是，那不行，要打击，要批评。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，同造反派可以说话，说他们还有些道理，那马上就找来批评。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，他跑到三新，到处可以说话，觉得亲近，我听到有人说，就把他找来，说他偏向了，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，就打击。所以，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，变质了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。这是必然的，你是资产阶级，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！资产阶级思想，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，就怕革命，就怕革自己的命。总想糊住，包住。这一下搞，都搞出来了，大家帮嘛，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，陈再道，连骨头带肉都不要，都算了，都是资产阶级了，都是腐化的东西了，今后要重新来脱胎换骨，又按主席的教导，重新革命，重新做人，脱胎换骨。过去的彻底抛掉，对我只能这样。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，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，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，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。你就看不出来，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，陈再道这个坏家伙，你什么都看出来了。林总讲的，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，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，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，革命的事业心，革命的干劲，完全消失了。

主席、林副主席的话，你不听，你不执行，你革什么命。怎么能不犯罪，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。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，所以，自己变了质，到了刘邓那里去了，自己还说自己对。对主席、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？只有敌人，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，只有敌人，只有反动派才不满。他（按指毛主席）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，世界人民的领袖。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。我们反对他，就不听，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，对抗无产阶级，对抗革命，反对伟大的革命，罪真大呀！所以，这次来，斗，那没有什么，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，又恨我这个错误，又想要我重新革命，相信主席，坚决执行主席的，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，还是想我回头来。所以这十天来，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，帮助我。开了几次斗争会，对我是很大的帮助。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，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。没出“七二零”事件，我解决好，“七二零”事件与我无关系，也不是我组织来的。这样想，不是你组织的，你一直在活动，一直在那里搞舆论，搞策动，不是你造成的是谁？所以罪责难逃。特别是我这个人，一个人死了算什么，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。所以，我们对主席、对中央、对中央文革，对武汉的造反派、武汉的人民、军队的广大指挥员、民兵。造成多大的恶果。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。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，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。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，面大、深广。几方面，这一方面吃了亏，造反派方面，被我们打击。扶植百万雄师起来，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，来镇压造反派，杀人、放火、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，这都是我们的罪过。还有什么说的。所以，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，就是犯罪，都是错误。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，镇压武汉革命，“七二零”事件的罪魁祸首，一点也不冤枉。反对毛主席路线，反对毛主席。罪该万死。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，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，还不罪该万死，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，蒙蔽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，干部、部队的指挥员，这是罪恶滔天。毒害大家，保陈再道。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，多害人，那个要喊打倒我，还要捉。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。这就是我们搞的么，我搞的。所以，我现在成了反革命，等着中央、人民审判，都是怪自己，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，到最后成了罪人，成了反革命。

### 三、 我的决心

最近主席几次指示，我犯了这么大的罪，当然，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，是他伟大的干

部政策，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、广大的人民。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，希望我重新做人，重新革命。主席讲的，来一个人就叫看哪，就念给我听。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没有，你念念，你看看，你把那个群众谅解，重新革命好好学习，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，来读文件给我听，帮助我，指出我的前途，指出重新革命，我能不走，是牛也应该教好了。所以，我不能辜负主席、林副主席、中央、周总理、中央文革，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，对我的教育，对我的希望。我也想啦，你不听毛主席的，重新革命，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。以前是带到火葬场，现在那还有火葬场。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，做什么不算毛主席，不靠党，不靠人民，你一事无成。活着吃饭，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。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。毛主席教导，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，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，我们战争几十年，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，比我强的人多哩，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，没有打死，那牺牲了多少，他们为什么？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，还在要你转变，承认错误，把错误交出来，那个野兽，牛都不如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。

武汉的文化大革命，是我在那里破坏了，搞的乌烟瘴气，搞的个“七二零”反革命事件，公开的向中央进攻，反中央、反毛主席，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。毛主席、中央、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，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。我一万个拥护。对我个人的处理，罢官、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，我没有半点怨言。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，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，指出前途，指出出路，还希望我重新革命，这使我感恩，感恩毛主席、林副主席、周总理、中央文革和大家。所以，对我的处理，我是坚决拥护，我是坚决拥护，一点怨言也没有。只有感恩不尽。今后要拿实际行动，你光说不行。象恩格斯说的，看一个人，不是光看他的文章，看他的演说，要看他在做什么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这个人坏了，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，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，现在重新做人，脱胎换骨，应该下这个决心。今后叫我劳动，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，拿到群众中去监督。所以，我是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，重新革命，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，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。是什么斗争呢？就是按主席、林副主席指示，用马克思主义，列宁主义，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。自己既修了，又有私，由私到修我都有。所以，只有用主席的思想，不断斗私批修，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，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，改造世界观。世界观不转变，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，那是搞不好的，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，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，听毛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，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。不管做什么，一定要跟着毛主席，听主席的话，照毛主席的指示做。

再一个，不是在这里说了，马上又去翻。又放炮了，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，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。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，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，初步的，一定要不断的，对错误认识不够的，还要不断的斗争，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。拿无产阶级立场，无产阶级的观点，无产阶级的思想，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，不断的改造。我只要下决心，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，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。只要自己不顽固，听说，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，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。真正地立场站过来，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，真正不怕丑，真正不怕割尾巴。丑就是这样丑嘛，已经全国都臭了么，你还包着干什么呢？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，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、听党的话，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，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，你不转变，你是个反革命么，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，要上靠毛主席，下靠广大干部、群众。我现在是个反革命，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，在人民监督下面，做人民的勤务员，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，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，来教育我，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。你再顽固不顽固，毛主席讲了，顽固是坚固，以后就不固了，就死了。你顽固，顽而不固了。所以，我还是不想死，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，我遵照主席的教导，我重新革命。能劳动几年，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！许多同志都说了：“不是你呀，联系到后代”，是啊，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。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。我感谢主席的教导，我一定照着做，同志们对

我的帮助、教育、我下决心不辜负，我今天讲到这里。

（根据录音整理）

---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本期编辑：   | 《华夏文摘》执行编辑： | 《CND》总编： |
| 丁凯文（美国） | 思语（美国）      | 陈天寒（美国）  |

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- 8 6 0 2

投稿专用地址：hxwz@cnd.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：cnd-cm@cnd.org

如需有关《CND》和《华夏文摘》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，获取

中文文件：hxwz-info@cnd.org 英文文件：cnd-info@cnd.org

《华夏文摘》万维网服务站（WWW）地址：<http://www.cnd.org/>

---